

DANGDAI ZHONGGUO JINRONG ZHUANXING DE HUIGU YU FANSI

当代中国金融转型的 回顾与反思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编

中国金融史
集刊第四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专题研究】

继往开来,稳定大局

——浅谈六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变迁	洪葭管 / 1
-----------------------	---------

六十年的变迁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夏小华 / 11
----------------------	----------

从计划金融体制到市场金融体制: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

视角	崔鸿雁 / 19
----------	----------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初期运作	吴景平 / 29
-----------------------	----------

从制度互补看我国国有银行改革	何 平 殷小斌 / 47
----------------------	--------------

1949—2009 年间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演化分析	兰日旭 / 71
--------------------------------	----------

农村金融市场、农户借贷需求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	赵学军 / 79
-------------------------------	----------

中国房地产金融的变迁与现状	任炳翼 / 96
---------------------	----------

航运中心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互动

——建国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述略	戴鞍钢 / 124
-----------------------	-----------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与法规	〔日〕乡田正万 / 132
--------------------	---------------

资本市场统合监管法制研究:全球金融法制变革与中国的

选择	许凌艳 / 142
----------	-----------

【学位论文】

接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演变研究	赵洪军 / 156
--------------------------	-----------

【档案史料】

上海解放初期钱业公会重要会议记录选编	何 品 / 192
--------------------------	-----------

【口述史料】

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的金融改革 龚浩成 / 249

【旧文新刊】

银钱业的新方向 / 257

【书 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缩影

——《中国工商银行史》评介 蒋立场 / 261

简评《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1949—1957年)》 万立明 / 265

【学术动态】

“六十年来的中国金融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青红 / 270

198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金融机构研究综述 董 昕 / 277

【资 料 架】

中国金融史论文资料目录(2006—2009年) 李 丽 辑录 / 304

近年来中国金融史研究生学位论文题录(四) 李 丽 辑录 / 330

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5年) 王静苑 辑录 / 337

在华外商银行大事记(1949—2009年) 孙婕瑶 辑录 / 356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大事记 丁雅坤 辑录 / 399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大事记 平由植 辑录 / 418

编者前言

本辑是《中国金融史集刊》的第四辑,主题为“当代中国金融转型的回顾与反思”。

“专题研究”栏收入数篇论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金融业经历的曲折坎坷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力图总结经验教训和揭示内在的规律。《继往开来,稳定大局——浅谈六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变迁》一文,把六十年金融变迁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7年、1958—1976年、1977—2000年、进入新世纪。作者特别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有效途径尚待探索和完善,稳定货币金融大局仍为头等大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资本流动频繁,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中国应当认真汲取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历史教训,正确评述以往金融历史,有效规划金融发展的未来。《从计划金融体制到市场金融体制: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一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变迁进程的路径选择以及政府行为作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今后金融变迁过程中的路径取向和政府应该担任的角色。《从制度互补看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一文利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从金融、企业与政府的相互关联中讨论国有银行改革,认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否实现其既定目标,完全取决于相关制度的配合推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各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1949—2009年间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演化分析》一文指出,六十年来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推进的,带有“倒逼”的特征,这延缓了农村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增加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后期成本;今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要逐步由政府主导为主转向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机制,逐渐建立起一个适应多层次需求的、竞争高效和可持续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市场、农户借贷需求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一文从对近些年有关文献作综述入手,认为应注重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缺陷、农户的借贷需求、金融部门对农户资金供给的错位等问题,审视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航运中心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互动》一文梳理了近代以来上海航运业与金融业互动发展的历史轨迹,指出在科学发展观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指导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到2020年可以实现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两个中心”的宏伟目标。《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初期运作》一文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后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史料与史实,梳理了中共关于货币制度安排和货币工作的基本文件,揭示了当时货币领域历史性变迁的丰富内容。《资本市场统合监管法制研究:全球金融法制变革与中国的选择》一文认为,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和资本市场统合监管法的诞生,使全球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模式仍是原来分业监管的模式,即只在中央一级设立几家管理机构分别进行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一局”的监管格局,中国能否最终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并制定金融统合监管法,这将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严峻课题。《中国房地产金融的变迁与现状》认为,与成熟的房地产金融市场相比,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还未成熟,存在很多问题,金融服务明显滞后于房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势在必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与法规》一文则分别分析了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及其对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亚洲各国的应对、2008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与全球性应对,指出当今超越国家利益的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十分必要,各国尤其应当努力避免“经济多米诺理论”,全力摆脱经济萧条与金融危机。

“学位论文”栏收入的《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演变研究》一文,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洪军的学位论文,其研究对象与本辑集刊主题相贴近,特向读者推荐。

本辑“档案史料”刊登了《上海解放初期钱业公会重要会议记录选编》,这些档案史料反映了在政权更替后的新形势下上海钱业的生存状况、上海钱业公会的应对措施和钱业高层人士的复杂心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特别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支持。

“口述史料”收入的《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金融改革》一文,记录了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造成先生的亲身经历,包括诸如组建全国性的交通银行和成立上海市区的城市信用社,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和

上海融资中心的筹建运作等,是进入新时期之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性转型的珍贵史料。

“旧文新刊”重登的《人民日报》1950年8月24日社论《银钱业的新方向》,代表了当时政府关于如何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等问题的政策主张,有助于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金融业的历史命运。

本辑还分别收入了对于《中国工商银行史》和《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1949—1957年)》两书的书评,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关心这两部关于当代中国金融研究的成果。

“学术动态”栏收入了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中心合办的“六十年来的中国金融变迁”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以及《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金融机构研究综述》。

在“资料架”中,除了继续提供近年来的中国金融史论文资料和学位论文目录之外,还收入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在华外商银行以及近两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大事记,这些或可视为当代中国金融转型的缩影和背景资料,供读者参考。

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为集刊撰稿和推荐稿件。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对本辑集刊编辑出版的大力支持。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2009年12月

继往开来,稳定大局

——浅谈六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变迁

洪葭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整整六十年。在中国历史上,这六十年是非凡的六十年,贫弱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方面,改革开放有了巨大成就,且在国际上取得一定地位,虽然历经曲折风波,但在关键时刻,总是能起稳定大局、继往开来的作用。回顾六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变迁,总结经验,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对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金融工作的任务与使命,规划未来金融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金融的短暂实践。金融服务经济： 三年恢复,五年创业(1949—1957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作为新中国金融事业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已于1948年12月1日在老解放区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同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货币走向统一,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正式形成。建国初期的几年中,金融方面的许多做法、措施,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从总体上讲是新民主主义金融的短暂实践。

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撤出大陆前,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它的中央银行拥有9亿美元,包括600多万两黄金,很快耗费掉大部分,尚存的200多万两黄金,于1948年12月1日从上海央行库房里把首批200万两运到台北中央银行收存,以后又运走57万两^①。留存的备日常业务需要的黄金19.8万两,到5月17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提走19.2万两,中央银行库房里只有0.5万两黄金和30万银元等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天之后前来接管。

面对陆续解放的各大城市缺粮、缺钱那种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困难局

^① 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页。

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地分支行协同有关经济部门致力于稳定金融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1949年6月初,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存在,也会影响一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乘机兴风作浪,掀抬金银价格,使银元、黄金的黑市价成倍上涨,在过去金融中心的上海,投机活动尤为猖獗。经中央批准,上海市委、市军管会果断地作出了取缔银元、黄金、美钞投机活动的决定,于6月10日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打击了操纵投机金银黑市的为首分子,使金银黑市价格迅速下降,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肃清,初步稳定了金融物价,也为巩固、扩大人民币在上海市场的阵地扫除了障碍。

投机分子扰乱金银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后,又在商品物资上囤积居奇,倒买倒卖。6月下旬到7月下旬,他们知道粮食库存不足,就哄抬粮价,粮价上涨,其他物价也随之上涨。在此时期,由于新解放区不断扩大,老解放区开始恢复生产,生产建设的支出增大,大量资金流到上海采购物资,投机资本遂再次兴风作浪。到11月间,上海的工业原料上涨,棉纱、粮食价格猛升,同时影响其他城市物价上涨,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波动。面对这种情况,上海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大量抛售棉纱、棉布等物资,金融部门加大收紧银根力度,财税和物资部门共同采取措施,抑制涨风。人民银行所有可运用的金融手段中最有力也最有成效的办法,是运用金融手段开办折实储蓄。凡持有人民币者可按人民银行逐日公告的折实单位牌价,折合成折实单位存储,支取时亦按折实单位牌价支付,储户不会因物价上涨而遭受损失。1949年11月16日银行收存的折实储蓄为1120万单位,每一单位牌价为0.1855元(原为旧人民币,已按1万元作1元折合成新人民币),到翌年2月28日增至4661万单位,每一单位牌价升至0.6546元。这种折实储蓄在物价波动时存储的人就更多,最多时占银行全部储蓄存款总额的91.3%^①,对稳定金融市场、安定居民心理,起了积极的、有力的作用。

1950年3月人民银行又开办定活两便储蓄,这种储蓄既有活期之便,又有定期之利,存储者十分踊跃。5月下旬,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储户存入时照货币数额收存,支付时如折实牌价上升,可按折实保值;如折实牌价持平或下降,则可按原存货币保本,并计利息。银行致力于居民储蓄业务的开展,符合《共同纲领》和《宪法》对居民私有财产予以保护的精神。

经过几个有关部门的细密准备,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重大决策,号召全国经济组织为实现财政收支、

^① 洪葭管主编:《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

全国物资调拨和全国现金收支的平衡(简称“三平”)而奋斗。各地银行致力于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并实行现金管理,积聚尽量多的资金,支持国营贸易部门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推动了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国家掌握了大量商品,增加了国家经济的领导力量,有力地促进了金融物价的稳定。从1950年第二季度起,货币发行趋于正常,银行的折实牌价3月份尚处于高位,以后即逐月低落。物价平稳,零售物价指数以1951年为100,1952年为99.6^①,通货膨胀趋势得以根本扭转。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尚在恢复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把已经延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加以制止,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货币金融稳定大局这一特定功能作用充分发挥的结果。

1953年国家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银行部门按照统一部署,推进各项业务,支持内外贸易、工业化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机构体制和业务体制方面均有不少改进,还在全国范围办理了解放前存款的清偿,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955年3月国家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以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这种只改变记账单位,不影响货币实际价值,并采用全国各阶层人民同一标准的兑换办法,深受人民拥护,亦为外国舆论所称道。新人民币的发行,消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痕迹,便利了生产和交换,进一步巩固了市场货币流通,为银行开展各项业务创造了良好条件,是60年来实行货币金融变革的一件大事。

1953—1957年期间,银行基本上运用信贷、利率杠杆开展各项存、放、汇业务,特别是在资金管理、成本核算方面认真贯彻增产节约的原则,有力地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1952年的43.8元降到27.4元,突出的如上海同期占用资金由19.08元下降到11.76元^②,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五年间由于信贷资金的支持,上海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4.7%,经济成效显著。总体说来,这一时期金融工作主要还是运用金融手段,遵循经济规律办事,虽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建立,但影响还不大,还没有被极“左”路线利用来成为信用失控的启动器。对新中国来说,这五年是艰难创业时期。在三年恢复、五年创业的经济建设中,金融起了中流砥柱、支撑大局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党和国家本来规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金融方面尚得以有这几

^①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中国金融统计》,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② 洪霞管:《信贷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初探》,《中国金融》2003年第15期。

年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金融实践。但没过多久，“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金融工作的干扰、破坏就接踵而来。

二、高度集中统一体制为信贷过度投放开启大门。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金融 工作的干扰与破坏(1958—1976年)

本来可以沿着三年恢复、五年创业时期金融运行较有成效的做法继续稳步推进经济发展,但在“左”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开始了。所谓“大跃进”,实是违背经济规律,大肆扩大信贷,大量投放货币,造成1959—1961年间的严重通胀。

“大跃进”中,出现许多惊人做法并提出狂热口号。先是在“鼓干劲、破陈规”这一口号下,银行原来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弃置一旁,管理流动资金的原则被视作教条,在信贷资金实际使用上,奉行“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贷”等所谓革新措施。不讲效果,不讲监督,助长了工业企业盲目生产,商业企业盲目收购,造成大量物资积压和浪费。有的甚至把贷款应有的申请、调查、审核、批准等手续都省略了,由信贷员当场“拍板”决定便可。更有甚者则是一接到企业借款电话,立刻由信贷员代办借款手续,干脆“送贷上门”。由于借款这样方便,许多企业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把银行贷款干脆作财政开支之用。1958—1961年间大量增加信贷投放,贷款额由277.5亿元骤增至803.5亿元^①,远远超过存款增加额。除自有资金垫补外,只有大肆增加货币发行。这四年间,流通中货币由52.8亿元猛增至125.7亿元^②,后来中央文件就指出当时的严重情况是“货币发行过多,商品严重不足,部分物价上涨”,大家听了十分惊愕,因为已有10年不见通胀了。尽管物价受控制,1961年零售物价指数仍猛升至16.2%。

中央看到问题严重,决定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并于1963年3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这时又是考验金融能否稳定大局,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作继往开来式历史性的援救的时刻。经过全国上下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努力,流通中货币额1961年压缩至106.5亿元,1963年又压缩至89.9亿元,1964年更压缩至80亿元,贷款额亦逐年压缩,到1964年为578.9亿元。

^① 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编:《中国金融统计》,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上述各项均系降低余额，不是减少增幅。这样大规模调整之后，经济效益亦随之提高。就信贷资金使用效率而言，上海地方工业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亦由1961年的17.09元降低为1965年的12.01元^①，为1952年有完整统计以来产值资金率最优良的年份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窃取了各级金融系统领导大权，江青反革命集团广造舆论，攻击信贷的监督管理是“管、卡、压”，诬蔑银行存在“单纯资金观点”、“条条专政”和“专家理财”，迫使银行信贷管理日益放松，一些良好的规章制度被冲掉，银行的机构被撤并，人员被调走，体制被打乱。到了197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在上海，市分行、区办事处和县支行亦先后与市、区、县财政局合并，市分行原有的各专业处一律撤销，只剩下一个“银行业务组”，配备十几个工作人员，其余人员都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在十年动乱中，财政减收，银行增贷，企业拖欠，体现经济效益的地方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从1965年的12.01元，又上升到1976年的21.32元，成为1952年有完整统计以来产值资金率最高的年份。“十年动乱”，把国民经济几乎拖到崩溃的边缘，金融方面虽然信贷收支失衡，货币投放亦多，但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助手几位副总理把总的闸门管住了，货币金融局面尚未被摧残殆尽，在以后转入拨乱反正和实施改革开放新的条件下，依然能起继往开来、支撑大局的作用。

三、金融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有效途径尚待探索和完善，稳定货币金融大局仍为头等大事(1977—2000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银行开始进行金融体制包括机构体制、业务范围、资金管理、贷款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在此之前，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部委一级，与财政部分设^②，省、市、自治区以下的银行亦应比照办理。1978年以前，全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是一家银行统揽一切业务的“大一统”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对于国家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以一家银行包揽一切金融业务，难以适应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需要，也不利于社会主义银行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金融体系这是客观必然。1979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重新成立(本是人行农

^① 洪葭管：《信贷资金使用效率问题新探》，《中国金融》2003年第15期，第417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村金融局);原为人行国际业务部的中国银行分设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升格为一级银行(原为财政部的一个管基本财务拨款的司局,曾是人行的第二营业部);人行执行央行职能后,1984年1月成立中国工商银行,经营由央行分离出来的工商信贷与储蓄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亦与人行脱钩,独立为经营实体。至此,中国人民银行已一分为六,从一个金融机构分为六个金融机构,新中国建立30年来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改革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金融改革的项目是众多的。《上海青年报》编的《见证上海金融改革三十年》就列举了一百项。我们从大的方面归纳为八大类:(一)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二)扩大经营范围;(三)改革单一银行信用形式;(四)改变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五)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六)改革利率制度;(七)谨慎运用市场机制,稳步开拓金融市场;(八)执行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详细介绍,只从资金和市场管理体制角度作一些阐述。

本来人民银行一家经营时银行业务受到很大限制,现在经营范围一扩大,贷款种类增加,银行很快成为聚集资金和分配资金的重要渠道。建国后的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中,银行平均每年增加的存款只占国民收入的3.1%,1979—1982年上升到平均每年占8.2%,1983年更占9.3%。1983年6月实施国企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本来这一办法明文规定,国企自己应建立自有流动资金的补充制度,国家财政拨给的资金和企业自提流动资金之和,工业企业应不低于70%,实际执行结果则是财政不再拨给,企业也不愿补充,遂使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成为人民银行一家统一供应流动资金。这也就容易造成信贷增加过度,货币投放过多。由于其他改革不配套,城乡货币化程度加深,80年代即有1985年、1988—1989年两次通货膨胀;1994年还因“乱拆借、乱开发、乱集资”,发生两位数通胀。经过大力压缩信贷,节约财政支出,主要是用大幅度提高利率(三年定期为年利率12.24%,有的年份还有财政出钱的保值补贴12%)的办法才把通胀势头压制下去。

“资金是物资的货币表现”,这句五六十年代流传的话,还是应该记住。商品生产和劳务所生成的资金,本来是实实在在的,是“干货”;而由虚拟资本股市疯涨产生的“市值”、楼市狂涨和其他投机手段产生的“市值”都不是实实在在的资金,而是虚拟的带有水分的泡沫,如果货币当局对此不加审察,而让资产泡沫不断吹大,那就潜伏着最终发生危机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资银行业存款迅猛增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

的问题,以上海银行业存款余额为例,过去在 70 年代每年是十几亿元增长,80 年代是几十亿元增长,90 年代则是上百亿元增长,1996—1997 年每年都是上千亿元增长(新世纪几年则是每年几千亿元增长)。从 1949 年到 1991 年的 42 年间全市存款由 0.18 亿元增至 954 亿元,还不到 1 000 亿元,而 1996 年一年就增长 1 040 亿元,变化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自从 1992 年 10 月党中央发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号召以来,我国在对外金融开放方面的决策和措施,都对“建设”十分必要,也很有利。1994 年实行汇率并轨,并在上海设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996 年 1 月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成立,加上 1990 年成立的证券交易所,这样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三者协调发展的框架也就有了基础。1996 年 12 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国。1997 年 7 月第二届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华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就可得到国民待遇并可援引市场准入原则添设分支机构,营业性外资银行继续增加,到 2000 年达到 54 家。

1997 年 7 月爆发亚洲金融危机,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济结构不合理,基础不扎实,存在资产泡沫和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等都是危机的成因,但资本项目过早放开,汇率高估和股市恶炒,则是对危机的发生起了触发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知道在全力以赴发展经济、金融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提高信贷资产管理,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把隐患消灭在襁褓之中。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管理体制的改革,撤销原有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分行,成立跨省、市、自治区的 9 大分行,体现了中央银行体制的垂直领导,有利于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90 年代中,整个金融管理体制有了进一步改革,由证监会管理证券行业,由保监会管理保险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对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行使监管权。2003 年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由银监会监管银行类金融机构,这样就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民银行由一家分设为 6 家,至此,央行又完成了“一分为四”的改革。在此前后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更能增强前瞻性和有效性,同时把监管职能转换为防范与化解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注重于稳定金融职能的发挥了。此后宏观经济变化较大,一会儿要防通胀,一会儿要防通缩,一会儿要遏制经济过热,一会儿又要刺激经济热起来,其中股票市场换手率高、投机性强,股市行情大起大落,也构成了对稳定金融的巨大冲击。又由于人民

币处于外有升值压力、内有通货膨胀威胁的两难境地,金融宏观调控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货币政策怎样才能既有针对性又有前瞻性,便成为对金融管理体制变迁后新的考验。

四、进入新世纪,国际资本流动频繁,美国发生 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中国金融市场波动 加剧,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金融市场波动亦更加显著。2001 年 9 月发生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指数危机,它的指数由半年前的最高点 5 040 点跌至 1 300 点。中国的 A 股市场指数先由 2 245 点跌至 998 点,又由 1 000 点升至 3 000 点,再一口气疯涨到 6 100 点,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债危机,2008 年 8 月转为金融危机后,A 股又从 6 100 点跌至 1 660 点,跌幅达 70%。中国 A 股市场在 2007 年是全球融资额较多的第三位,2008 年则是全球股票市价跌幅最大的第三位。最近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体系内生的危机,于是也有中国学者提出:类似的金融危机中国会不会发生?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会不会发生中国金融体系的内生危机?

这是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制也要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体系。怎样看待这次美国爆发并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是考验经济学派和金融学说的一场大辩论。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监管未到位,创新太过头,而是资产泡沫太严重。怎样鉴别、认识泡沫的程度,以及泡沫破裂后如何处置和掌控,这也属于经济学至为深刻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从研究金融史变迁角度出发,不妨关注一下曾被称为“金融大鳄”但颇有自我解剖勇气的乔治·索罗斯揭示危机实质和暴露风险巨大的一段话:“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问题甚至要比当年困扰罗斯福总统的还要严重。1929 年末,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 GDP 的 160%,由于债务累加和 GDP 下滑,到 1932 年上升到 GDP 的 260%。2008 年股灾时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 GDP 的 365%,而且必定会上升到 500%(这项运算还没有考虑到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①“除了先人为引发通胀而后再进行治理,没有其他办法能防止出现全球通缩和经济衰退这种远离平衡的经济状况”^①。

财产大缩水,华尔街大公司亏损严重,有的倒闭,有的破产,有的被收购,

^① 《2008 年的崩溃风潮(下)》,《南方周末》2009 年 3 月 5 日。

连一向被誉为最佳银行的美国三甲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股票市值在这次危机中最严重时也分别跌掉了96%、89%和57%，这应该是玩弄虚拟资本者的“前车之鉴”。

六十年来的最末一段半年时间，中国金融方面几个统计数字都十分惊人。到2009年6月，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都创新世纪各年的新高，M2增速同比增长28.5%，贷款单是6月份就贷放1.53万亿元。外汇储备突破2万亿美元。全国银行存款余额，1952年末是93.3亿元，1991年末是14864.1亿元^①，2009年6月末为58.05万亿元^②，比1991年增大38倍，这固然能构成银行资产的来源，但却是对存户负债的最大风险。至于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如此之大，诚然是为保增长的需要，但不可避免地亦会带来不良的后遗症。上半年六个月各银行贷款达7.7万亿元，这对央行下半年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以保持金融大局的稳定，势必带来更大的困难。

怎样对待和汲取这次美国爆发、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不同界别会有不同态度。对正在从事金融实务的人来说，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是为了下一次谋求更大利润。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寻求正确的金融稳定之路，然后更好地发展经济、创造政绩。对金融史学界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极好机会，应该广泛积累资料，博采群体智慧，深入分析研究，写出更有见解、更符合实际、有现实意义的当代金融史来。不论持哪种态度，大家又是面临如何稳定金融大局、继往开来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讨论六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变迁问题，不难省悟到：（一）货币和信贷有其自身运动规律，过量的货币供应、过度的信贷扩张，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二）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可以说已在国际上取得一定的地位，但我们更要看到自己的金融体系脆弱的一面。我们应该把巨额外汇储备看作货币发行的现金准备，美国尽管是最大债务国，但美联储的黄金储备仍有8500吨，为各国之首（我国为1054吨，占第六位）。巨额外汇储备既是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因素，又是通货膨胀时得以抑制通胀的物质资源。（三）严控泡沫，坚持不搞泡沫经济，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首先要关注的是市场泡沫化倾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深切理解虚拟资本是制造泡沫资产的源泉，是酝酿金融危机最易爆的雷管。只看到泡沫带来的暂时的虚假繁荣，看不到泡沫破裂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祸害，是不利于经济

^①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中国金融统计》，第7页。

^② 《中国金融》2009年第14期。

成长和社会和谐的。

如果忽视或忘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危害,不认真汲取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历史教训,我们就不能正确评述以往的金融历史,也就不可能有效规划金融发展的未来。

(作者洪葭管,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六十年的变迁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夏小华

《六十年的变迁——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这个题目很大，如果要讲六十年，我怕时间不够，重点主要是讲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一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概念，第二部分谈中国商业银行的沿革，第三部分阐述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特点。因为我不是专门从事金融研究的，可能有一些观点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什么是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按照其发源地——西方的概念，主要是指办理“自偿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用现代的概念看，也即主要办理“商业循环贷款”的机构，由于在最初主要从事的是贸易融资业务，故而被称作“商业银行”。它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城邦。从今天全球可以被称为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看，办理的业务已远远不止所谓“自偿性”的“商业循环贷款”，业务范围也远不止以往商业银行传统的“存放汇”业务。但就其业务范围而言，在所有可以被称为“银行”的金融机构中，按标准划分，商业银行仍存在与中央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的区隔：前者主要是发钞行，决定货币供应量，行使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制订和执行的职能；后者则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金融大危机后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关于银行分业经营的要求有关。这个法案内容不多，它主要是确定了商业银行是唯一可以吸收活期存款的金融机构，只能经营政府债券的包销业务，进行投资代理和从事短期和中期放款业务，不能对工商业进行投资，包括直接买卖股票。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时候，大量商业银行参与了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买卖，损失惨重，加重了危机，所以就出台了这么一个法案。与之相区别，投资银行则专司经营证券投资业务。我们比较熟悉的几

* 本文系根据录音整理。